

继续追求

——二十年间的学与思

傅白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继续追求

二十年间的学与思

傅白芦 著 湖南人民出版社

责任编辑:彭富强
装帧设计:尹文君

继 续 追 求
——二十年间的学与思

傅白芦 著

*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展览馆路 66 号 邮编:410005)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出版发行学校印刷厂印刷

200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298,000

ISBN7-5438-2796-4
C·126 定价:22.00 元

序

生活是一本大书，生命不息，阅读难止。印成了文字的那些有价值的本本，看似小书，其实也都是大书，古往今来，不少认真而又清白地做人的人，为写下那几万、十几万、几十万、几百万字，几乎付出了毕生的精力。正是那些小书，成为了人类生活这大书的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这样的小书，恐怕谁也无法作出接近准确的统计。我们的令人尊敬的前辈，就聪明地使用了“书山”、“学海”这四个字去形容它。是生活的书，把我引上去书中过生活的路；是书中过的生活，又把我带进生活的书里。“人生苦短”，五十年的编辑生涯，还只阅读了生活的书中的一页，在书山脚下只迈开登攀的一步，在学海边沿也只品尝到一滴海水的滋味。

在编辑工作中，我没有机会到现在所说的专业报道部或专业编辑室中去生活，学习难于系统，读书无法专攻，这就决定了这种生活的乱而且杂，它是鲁迅所说的“职业的读书”。倘有闲暇，鲁迅所希望的“嗜好的读书”，也曾是有过的，可惜为时不多。《论语·为政》中云：“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它在这里，实际上已把学与思作为认识和理解人生与世界的一对范畴。徐特老说得更通俗更精到：“不动笔墨不读书”。读了书不但要动脑筋，还要动笔墨，把所学所思用笔墨来表述。我虽没有养成这样良好的读书习惯，在读书之际或之余，动动脑筋，动动笔墨也是难以完全避免的。1957年夏季以前写的一些时评、政论和小册子，全是出于工作的需要，早已随时光的流逝而消失，还是如宋词中所吟：“从前往事都休”，“懒寻旧梦”吧。

距离 1957 年夏季近 22 年之后，我告别了修补地球的生活，去北京参加了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部的两个学术杂志的编辑工作。还是由于工作的需要，学习的侧重方面必须转到社会科学的学术领域，工作之余，写过一些学习札记。回到湖南后，又结识了学术界的一些朋友，这方面的学习及其札记由此得以继续。结集在这里的，就是二十年间学与思的札记。

这二十年，是开展了真理标准问题讨论后的二十年，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动脑筋想问题的二十年，也是人们萌动新的觉醒和新的追求的二十年。所学所思，远远胜于往昔；而且，这种思考，是用“长在自己肩膀上的脑袋”（列宁语）进行的。由此，也就悟出了一个道理：我们既要在追求真理中接受真理，又要在接受真理后继续对真理的追求。因为，对真理和对真理的正确性认识，从来只能是暂时的、相对的。我深知，结集在这里的札记，存在着种种不足，其中有的还会有谬误，它期待方家的匡正，借以鞭策自己继续追求。

这些札记，按写作的时间先后排列，分为两辑。《思痛编》中的六篇，是对十年浩劫的反思，可说是劫余思痛录；《思索编》中的篇什，着重于为增强社会科学研究的科学性而作的探求，希望在学术研究领域和自己的探求中，也能避免重犯错误。它们虽然在努力的挣开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的精神枷锁，但无力摆脱贫自己的学养对自己的束缚，自己的存在条件决定着自己不可能超越自己。惶愧交集，却无怨悔，如此而已矣。

傅小善
1999 年 5 月

目 录

序 (1)

思 痛 编

对一个词的另一种分析 (3)

——也谈“长官意志”

“序”(3) 史的小小考察(4) 难以忘却的恶性

肿瘤的祸害(6) 美其名曰“良性肿瘤”，也危害肌
体(8) 闻者足戒，莫动肝火(11)

不要划“小圈子”，要划“最大的圈子” (14)

——介绍《周恩来选集》上卷中关于团结的论述

加强全党规模的有原则的大团结(14) 团结广大
人民群众一道前进(19)

避免重犯错误和加强科学的研究 (24)

——学习《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之
一得

郑重的政党的标志(24) 深思熟虑的拨乱反正是
科学的研究的积极成果(25) 科学研究本身也要避
免重犯错误(31)

关于道德问题的思索 (39)

——《在彭总身边》、《最后的年月》读后随想

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具有崇高的道德性质

(39) 共产主义战士在实践中表现出崇高的道德品质(43)

中国共产主义道德发展史上的惨痛教训和伟大转折(55)

共产主义道德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62)

清除“左”倾错误影响的思想武器 (93)

——学习《邓小平文选》(1975—1982)札记

在面临严峻的抉择的时刻，邓小平代表着党内的健康力量，尊重人民的意愿，挺身而出，尖锐地旗帜鲜明地批评了要继续坚持“文化大革命”和它以前的

“左”倾错误的“两个凡是”的方针(93) 邓小平用摆事实、讲道理的正确方法，论证了“两个凡是”的谬误，指出它是反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96)

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的同时，又从正面阐明了怎样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原则问题，回答了怎样才是真正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这个众所关心的原则问题(99) 邓小平在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提出必须完整地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的同时，为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实际上就是为否定“文化大革命”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对端正党的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做了重要贡献(105)

邓小平还从组织路线的角度，从党和国家的命运的高度指出：搞“两个凡是”实际上是换个面貌来坚持林彪、“四人帮”那一套，一定要警惕，要注意，不解决这个问题，可能要再来一次灾难(116)

《邓小平文选》是清除“左”倾错误影响的思想武器，也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性文献
(120) 学习后的沉思(132)

对近代中国历史和历史学的历史反思 (137)

——黎澍著《再思集》述评

揭示林彪、“四人帮”反革命事变的主要特征和本质：在政治、经济、文教科、组织、社会生活等各个领域加速向封建时代倒退回去(138) 重新认识近代中国历史的重大事件后作出论断：要打破生产的封建束缚，必须有彻底的反封建的思想革命(142) 回顾新民主主义革命以来的历史事实，认为：消灭封建残余的影响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条件(151) 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反思，导致对历史学自身的反思(164) 为维护和提高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科学性进行的一次实际而具体的探讨(184)

思 索 编

- 学术讨论需要好的风气 (199)
我为什么建议不刊用这篇文章？ (201)
——在一次审稿会上的发言
试论鲁迅与历史科学 (218)
——纪念鲁迅诞生 100 周年
为了对一位学人的纪念 (260)
——韩长耕两篇学术论文的读后感
“当代中国哲学”讨论会期间的感受 (265)
《老子》研究杂议 (269)

由对左宗棠的研究想到的.....	(273)
关于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材的编写	(277)
——致《社会科学文献检索教程》编著者李必祥等	
我读《人性论》.....	(281)
——给中南工业大学出版社的审读报告	
勇于敲扣人性理论的大门	(290)
——序曾创新著《人性论》	
在黄兴研究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295)
对“新闻无学”论的一种回答	(299)
——序杨善清著《新闻背景与新闻写作》	
加强研究的科学性的探求	(303)
——序陈远宁著《王船山政治观研究》	
疑义相与析:与国内外黑格尔学者对话.....	(309)
——邓晓芒著《思辨的张力——黑格尔辩证法新探》述评	
道家思想对中华民族性格的二重影响	(326)
——吕峰琛著《道家与民族性格》简评	
荆楚故地的“道家文化热”	(330)
弥足珍贵的新闻史料	(334)
为一本书“补漏”	(336)
——兼及撰写革命回忆录的真实性问题	
读稿偶拾(16 则)	(347)
跋	(375)

思 痛 编

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
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作为补偿的。

——恩格斯

对一个词的另一种分析 ——也谈“长官意志”

“序”

六年以前，读到一则思想评论。^① 那篇文章的作者对“长官意志”一词进行他自己的理解和分析，见解有独到之处，诚为一家之言。当时，我觉得还可以有另一种理解，还可以作另一种分析，于是写下了不短也不长的一些意见。其后，因为对这个词儿的议论戛然而止，我就将它束之高阁了。

本来，对任何一个词的使用，都是要讲究准确的。词儿不可滥用，我从来是十分赞同。但如果用得恰到好处，倒也并无妨碍，正如大家所主张的“不因文废人”或“不因人废文”那样，可以不因滥而废词嘛。关键是要把这个词的含义真正搞清楚。因此，我又想起束之高阁了的那份东西来，甚至还想将它奉献给读者。如果能够作为读书心得而与同志们“疑义相与析”，也许不无意义；如果能够为探讨“左”的思想产生的认识根源、为健全和发展社会主义民主、为防止那种鼓虚劲搞浮夸搞形式主义的旧习气的泛起、为反对新的不正之风等提供些微谈助，那就更是喜出望外了，丝毫没有主张滥用这个词的意思。

是为“序”。

1986年1月

^① 《“长官意志”析》，载《红旗》1980年第2期。

史的小小考察

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中，最早使用“长官意志”这个词的是列宁。这见于《什么是“人民之友”以及如何攻击社会主义主义者？》，翻开《列宁全集》第一卷第 122 页就可找到。列宁是这样写的：

达尔文推翻了那种把动植物种看做彼此毫无联系的、偶然的、“神造的”、不变的东西的观点，第一次把生物学放在完全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物种的变异性和平续性，同样，马克思也推翻了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的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偶然产生和变化的、机械的个人结合体的观点，第一次把社会学置于科学的基础上，确定了社会经济形态是一定生产关系的总和，确定了这种形态的发展是自然历史过程。”

列宁的这篇文章，写于 1894 年，后人把它誉为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的纲领性文件。19 世纪 90 年代的俄国民粹派，自称为“人民之友”，自谓为“社会主义者”，但是他们却否认历史规律的客观性，认为历史发展的决定动力是个别杰出的人物，是“英雄”，至于群众、人民，则不过是理应盲目服从他们那些“英雄”的“群氓”。当时，他们办了一个《俄国财富》月刊，这份杂志鼓吹同沙皇政府搞调和，还激烈反对马克思主义，大肆攻击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其魁首之一叫做米海洛夫斯基，据说他读过许多马克思主义文献，并且“拼命思索出一个深奥的问题”来了，那就是：“马克思究竟在哪一部著作中叙述了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达尔文的全部著作是什么呢？这就是把堆积如山的实际材料总结为几点概括的、彼此紧相联系的思想。马克思

的与此相称的著作究竟在哪里呢？”将达尔文与马克思相提并论，本出现于恩格斯 1883 年 3 月 17 日在伦敦海格特公墓安葬马克思时的讲话中。他当时说：“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米海洛夫斯基攻击马克思，意在否定他所发现的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否定他的唯物史观。列宁于是写了这篇文章批驳米海洛夫斯基，文章旁征博引，议论风生，至为精辟。他列举了大量无可争辩的论据之后，反问道：“马克思在哪一部著作中没有叙述过自己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呢？”此文一出，给俄罗斯的沉沉黑夜投一光明。在短短的时间内，胶印、手抄、打字机打字的各种版本，秘密地迅速流传于彼得堡、莫斯科、基辅以及顿河岸边的罗斯托夫等十多个大小城镇，影响至大，使处于特权地位、高踞于阅览室或图书馆中的《俄国财富》徒唤奈何！

列宁写的这番话，我以为至少包含三层意思：其一是，马克思发现：社会不是“偶然产生和变化的”，也不是“机械的个人结合体”，它是按照客观规律发展的；其二是，马克思所发现的客观规律是：社会经济形态的发展，是一种“自然历史过程”，而不是任何人当然也不是帝王将相等各色“英雄”们的“意志过程”，这正是唯物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其三是，马克思发现的这条客观规律，是不按任何人的意志随便改变的，亦即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去改变自然历史过程。在列宁看来，人，是指所有的人，特别是指掌握了权柄的“长官”，或者说是人所组成而由某个阶级统治的“社会”，或者说是由某个阶级的“长官”所组成的“政府”，都是一样，它们的意志绝不能随便改变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这就是说，任何个人、社会、阶级、政府、领袖都不可能改变这条规律。封建社会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如此，社会主义社会也如此；地主阶级如此，资产阶级如此，无产阶级也如此。概不例外。

八十多年前，列宁使用的“长官的意志”这个词，大概因为它高度概括、十分形象而又生动吧，后来的人们常借用它来讽喻那些不尊重客观规律，不愿受历史既定条件的制约，凭主观意志随心所欲地为人处事的领导者，这原是没有什么恶意的，道理相当清楚，毋须多说。

难以忘却的恶性肿瘤的祸害

在社会主义国家，为什么还要用这个词？用更确切一些的语言不好吗？

如果我们的国家消灭了这种现象，而且也忘却了对这种现象的回忆，不用这个词自然是最好不过的。

然而，历史的经验和严酷的教训教育了大多数的人民，这种现象远远没有消灭，恶性肿瘤的祸害至今难以使人们忘却，这不是谁愿意或不愿意使用这个词的问题。

事物的转化有一个过程，不能防微怎可杜渐？恶性肿瘤的危害，是因为多少年前就忽视了病毒的入侵。君不见，“那种把社会看做可按长官的意志（或者说按社会意志和政府意志，都是一样）随便改变的……观点”，尽管早已为马克思在理论上推翻了，并为列宁所尖锐批评，还被中国革命实践中遭遇的重大挫折证实了它的极端荒谬性，但在我们的国家里，有人还要把它扶起，输氧，使它复活，甚至想使它返童。最令人触目惊心的，莫过于林彪、“四人帮”这两个反革命阴谋集团的所作所为了。他们在取得了“长官”的地位之后，信誓旦旦，口喊“高举”，手挥“宝书”，实际上却是地地道道的尼采的信徒。尼采说：“这个世界就是权力意志——岂有他哉！”^① 林彪、“四人帮”不正是如此吗？

^① 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24页。

按其实际行动观察，尼采还瞠乎其后哩！林彪、“四人帮”这批权迷心窍的“长官”，打着党、国家、阶级、社会、群众的幌子，以其个人及帮派的权力决定一切，以其个人及集团的意志决定一切，倒行逆施，肆无忌惮。在意识形态领域，主观和客观、精神和物质的关系可以任意颠倒；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可以任意夸大；对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可以随心所欲地进行所谓革命；阶级可以由他们随意划分，“敌对阶级分子”可以由他们随意咬定，他们钦定的“阶级斗争”还永远是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在这种“阶级斗争”的掩护下，他们以权谋利，巧取豪夺，道德败坏，生活糜烂，无所不用其极。在经济工作和其他实际工作中，他们任意推行各种“全面专政”，随口叫喊花样翻新的什么“宁要”和“不要”，竟可以把国民经济推到濒于崩溃的边缘，也在所不顾。摧残之重，荼毒之深，危害之烈，实属罕见。“长官意志”——“权力意志”——“唯意志论”的恶性发展，病变为癌，几乎断送了整个党、国家、民族的生命，这个教训难道还不深刻吗？

仅仅从这几个人的品质去解释，显然是不够的。这倒使人们清醒起来，我们和林彪、“四人帮”的斗争，原来实质上是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斗争，是历史唯物主义和历史唯心主义的斗争，是科学社会主义和假社会主义的斗争。斗争的结果，又一次证实了这条真理，妄图否定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终究被否定，妄图推翻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人终究被推翻。历史的辩证法就是如此无情。

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想来大家是会一致的，不会有什分歧的。

美其名曰“良性肿瘤”，也危害肌体

在粉碎了林彪、“四人帮”以后的现在，对我们的同志特别是对也曾遭受到林彪、“四人帮”荼毒的，并且与之作过坚决斗争的同志，如果“出于好心，办了错事”，也用这个词合适吗？

这里需要冷静的思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林彪、“四人帮”的出现，不是骤然从天而降；他们虽然已被历史所埋葬，其臭气也决不能刹时尽除；千丝万缕，其极左的流毒，短暂停时间内怎能清理妥善？何况我们还背着两大包袱。

一个是历史形成的。中国封建社会的长期停滞，封建传统思想影响至深且广，较之19世纪中期法国的“小农的政治影响表现为行政权力支配社会”^①尤为强烈，使我们的民族承受了鲁迅所说的那种“因袭的重担”；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伟大胜利之后，由于大家知道的原因，来不及彻底清除旧社会、旧制度、旧思想的残余和影响。比如说，所谓“一朝权在手，且把令来行”，所谓“令出法随”，等等；不都带有浓厚的封建特性吗？林彪、“四人帮”这批封建余孽也正是借助于它们由潜滋暗长而发展到明火执仗为所欲为的，在他们肆虐的那个年月，权力意志决定论竟被披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外衣，多少事被扭曲得叫人眼花缭乱真伪难辨！在这条曲折的道路上，“一切为了权”、“有权就有了一切”的阴魂纠缠不休，我们的某些同志（其中有的还是好同志）耳濡目染，受影响于无形之中，行谬误于非自觉之时，自然是难于完全避免的。当然，有的人实际上并不是那样“非自觉”的。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693页。